

高等教育学的方法论浅谈

郭馨逸

河海大学

[摘要]高等教育学从诞生到确立为二级学科,是我国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不断努力研究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流失,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学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在学科建设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学科建设的依附性使得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时受到非议,因其学科建设并未真正的处于正确的轨道上,高等教学甚至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所以,积极研究高等教育学的方法论,重新审视我国高等教学学科的建设路径,十分关键,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科建设方法论的创新,促进高等教育学的不断发展进步。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 学科建设; 方法论; 建设路径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271

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科学学”路径——范式

历史分析的逻辑方法和中外比较历史的比较方法是研究人文社科历史的必要方法或重要方法。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在长期的比较比较社会人类学人类学研究工作中,也对比较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社会比较史学的基本方法作了相关的论述。在他看来,比较历史人类学的一般解释方法,即比较比较民族学史的解釋方法,主要集中在人类起源时期和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那些个别的重大科学事件上。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比较方法,因为它所依据的不是真正有充分证据的“信史”,而是作者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假设或建构。历史比较研究的一般方法是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历史归纳和世界人类文化活动研究中的一些应用。归纳法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形成一般通则,发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比较研究方法的重点是比较研究的本质、功能特征和一般性通则。它通常包括两个共时性质的比较分析和文化历时性的比较分析。共时性纵向比较通常侧重于研究过去某一发展时期社会文化结构的历史本质规律和结构功能特点,文化历时性比较则侧重于文化-社会种在时间层面的纵向比较变化和世界文化变化整体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就布朗而言,他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但他表示,他的意图不是将它们分开,而是只有真正区分这两种方法,他才能将它们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分工与合作才能相辅相成。布朗教授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解释历史人类学和比较历史研究历史方法的人,在他对历史高等教育多学科观点的实证研究中,他详细阐述了比较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历史学比较分析的常用方法。从比较人类学理论和比较教育学方法两个不同专业的角度,全面介绍了这两种科学方法的应用,其积极作用是不同的。从高等教育方法论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潘懋元先生认为,在高等教育实践研究中,必须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基本原理的新方法。一是“从历史中学习理论”,学习中外人文社会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掌握学术客观规律和研究实践规律,全面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工作水平;二是“从历史中学习理论”,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和探索中认识历史的本质,抛弃历史的糟粕。借鉴国外先进历史教科书中的各种新的历史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是对历史的研究,也是对教育学的继续发展。即使学生要认真学习,注意总结,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学生重蹈前人历史错误的覆辙。也就是说,要在实践中逐步学会扬弃,避免学生盲目

自我否定历史理论,盲目否定历史兼收并蓄,教师要真正注意把学生的史学理论史和实践的学习与中国现状史学领域的实际历史实践结合起来。

总之,如果对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的全面研究不是单纯的历史分析或纵向比较式研究,那么教育研究本身就根本不是对现代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全面研究。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人类学”路径——“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

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是大多数人文社科所需要遵循的方法。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在对社会人类学方法的研究过程中对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进行了相关阐述。他认为历史的解释方法,即民族学的方法,是集中在起源和发展阶段上,集中在个别的事件上,这不是真正历史学家的方法,因为它依据的不是有据可查的“信史”,而是对历史的臆测或构拟。而比较的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归纳的本质就是形成通则,发现一般规律。比较方法关注的是本质、功能和通则。它包括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共时性的比较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对文化的本质与功能进行研究,而历时性比较强调一种时间上的纵向变化,是对文化变迁的规律性进行研究。布朗在此虽然将两种方法进行了区别,但是他并不是将两种方法割裂开,而是只有将两种方法区别清楚,才能把这两种方法集合好,分工合作才能相得益彰。布朗是如此对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进行了人类学的解释,潘懋元先生在对高等教育多学科观点的研究中也对历史学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从人类学和教育学两种不同的角度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介绍,肯定也是有一定区别的。潘懋元先生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出发,认为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中需要借鉴历史学的方法。首先“论从史出”,研究人文社科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掌握客观研究规律和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其次“以论论史”,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历史学的方法研究高等教育学,既要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也要学会扬弃,避免全盘否定和兼收并蓄,需要将历史的研究与现状的研究统一起来。

总之,如果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是历史的或比较的,那么这种研究就不是对高等教育的一般化的科学研究。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社会学”路径——“价值原则”

教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一直都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路径的探讨,自然也少不了社会学视角下的方法论研究。

教育学研究与现代社会学方法之间的方法论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因此,在我国高校教育学发展与建设的基本路径研究中,必然要纳入现代社会学视角框架下的教育学研究方法论。

社会学集大成者马克思和韦伯阿在其关于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初步研究论文中指出,社会科学往往不同于大多数自然科学。自然或科学文化往往侧重于事物之间经常交替变化的现象或普遍规律,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更侧重于个别文化事件的关系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其深刻和丰富的社会意义永远不可能包含在这些事件的具体概念或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中。韦伯在强调现代社会学体系普遍主观性特征的客观性的同时,也试图探索社会学我国社会科学系统的普遍因果关系基础和各种科学方法的一般常规性准则。从社会学方法论分析的基本观点来看,韦伯学派一方面是证实主义的集中体现,强调对特定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以在较小范围内确立文化普遍意义的假设;另一方面是积极和消极实证主义的又一综合体现,强调文化“主观”特征属性和普遍普遍文化意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范围和价值。高等教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是否不仅要保持自身的历史主观性特征特征,还要保持自身的现实客观性基础特征特征?事实上,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科学来分析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没有高等史教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我们要特别注意“认识”理论的重要思想功能,我们的主要思想目标仍然是认识我国社会科学的自身独特性。正如马克思韦伯先生所说:“一方面,我们要理解个别事件在其表现形式上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要探索历史上这些个别事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的原因”。“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教育社会科学方法论,尤其是,我应该强调的原则是价值原则,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论要建立在在对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价值原则的全面准确的系统认识基础上,在今后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过程中,要更加严格,坚持“外科学”和“内科学”提出的两个基本价值原则原则的界限。首先,我们需要提到“科学外”的价值立场,即要实现价值关联,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这个时候需要用自己的价值立场,真正需要将经验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才能有意义。一旦你进入书房,它要求研究者将自己严格限制在“科学”价值上,杜绝任何“科学外”“价值观的倾向,也就是说,“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强调的是科学研究中不做价值判断,不取消价值关系,不要求研究人员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主观意图强加给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而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不增加“如何做”等价值引导。作为一门高度经验科学,要求每一位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者区分“事实”与“价值观念”、“存在”与“应然”、“会知道”与“会评价”、“会判断”与“不会判断”,简单地说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将来应该继续做什么。

迪尔凯姆还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准则。它将扩展到以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学为主要研究目的的方法论原则,首先,作为观察社会事实现象的一般准则,高等教育学理论和现代社会学一样,重视对各种社会事实问题的观察,并坚持把这种社会事实研究作为一种规范的“事物”来进行,即按照韦伯韦伯强调的方法方法论原则摒弃对一切事物的预错判的看法,保持人类价值的绝对中立性。其次,社会科学是解释某些社会事实本身的一般标准。高等教育社会学的方法也要求社会科学对某些社会事实作出完整的解释,包括系统分析社会因果结构和比较分析社会功能的作用。反过来,社会事实也必须根据其他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实方法进行全面的解释。第三是教育社会学本身的一般标准,如迪尔凯姆的观点,即只有比较法的研究方法才能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社会学本身的方法论,也可以适用于我国的中国高等教育学。

四、结语

一句话,根据土著潘懋元先生对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充分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论研究,无论是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之路、“范式”之路、“人类学”之路、“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之路、“社会学”之路、“价值原则”之路,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道路的探讨与研究都是漫长而持续的。此外,还包括《胡塞尔》中的现象学、利科尔中的解释学、《曼海姆》中的知识社会学等,这些都可以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理论新的学科建设实践路径,对科学方法论进行深入探讨。但无论如何,在新时代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理论的正确指引下,高等教育学研究作为一门应用型应用性学科目前还很不成发展。在适应新时代发展、适应未来社会的教育建设和道路中,我们必须首先认真思考它的未来发展。只有采用适合学科和自身实际的教育方法论,才能努力把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与发展建设成为具有科学立足点和教育立足点的一流教育教育学科,使高等教育学逐步成为利国利民的社会学科。最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立场之一,就是要能够充分认识到普通人的易错性,理解判断对错的客观标准,不断改造和升华。因此,我们要研究高等教育学中的某些方法论观点,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和方法,都不是预先注定的,而是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不断修正的。

参考文献

- [1]姚计海.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03):64-71,169.
- [2]袁振国.中国教育需要实证研究[J].中国教育科学,2017,(02):3.
-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会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郭馨逸 女 1993.11.16 满族 吉林白城 助教 硕士研究生 河海大学 教育学。